

从宗教到世俗：启蒙运动时期西欧 社会救济思想的转型与创新

丁建定

【摘要】 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欧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对社会救济的认识构成该时期西欧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关于贫困及其成因的解释、对穷人提供救济必要性的争论、实施适度救济的有限共识，以及有关如何预防贫困所提出的全新主张等，构成这一时期西欧社会救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西欧的社会救济思想虽然具有鲜明的复杂性，但是，从宗教性转向世俗性则是其根本特征。启蒙运动时期西欧的社会救济思想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 启蒙运动；贫困；社会救济；互助保险；转型；创新

17—18 世纪是西欧的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与之前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起，被称为西方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确立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确立了在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生活时代宗教的地位，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启蒙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对社会救济的思想主张，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却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比较少的领域。本文尝试对其做系统探讨。

一、关于贫困及其原因的解释

对西欧贫困问题及其成因的解释，是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启蒙思想家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揭示贫困问题及其复杂原因。斯威夫特揭露了英国底层人群的悲惨生活状况，他指出，“一些精神沮丧的人很大程度上与巨大数量的穷人有关，这些穷人年老、疾病缠身，而且不能工作……但是我并非没有一点同情心，因为众所周知，他们在饥寒交迫之中，在污秽和到处布满了蟑螂和细菌的环境中，每天都在以能够合理预见的速度很快地死去和腐烂。”^①

【作者简介】 丁建定，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思想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史（多卷本）”（19ZDA234）。

① 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26-227 页。

笛福将贫困归因为社会道德败坏。他指出，“道德败坏无疑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疾病。为非作歹在我国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很难说出它的本原。可是不管这件事情多么难办，我们还是容易回顾到一个时期，那时，我们一般说来还不像现在这样深染恶习。而如此追溯一下就似乎足够查明我们现今何以会背道离德的原因了。”^① 笛福将老年贫困归因为个人在年轻时不对可能的老年贫困做任何预防。他指出，有些人还不如野兽有头脑，在老年以前不愿意做好防老的准备。对付这种人，也许可以由当局采取强迫措施：（1）教会执事和治安推事应该派遣教区管事陪同当局职员到教区较穷的居民家里去，告诉他们，现在给他们想出的免于老年人因贫困受罪的办法是如此的体面，如果他们不肯为防备日后的贫困从收入中省下这样小的一笔钱而拒绝加入保险，此后教区对他们将不予救济；（2）各教区的教会执事可以拒绝未加入当局保险的个人和家庭迁入他们的教区；（3）应该公开要求任何人不得向乞丐施舍任何东西，这样一来，所有的一般乞丐在一定时间后都会被清除，从而将有效地最终杜绝行乞现象。^②

孟德维尔将德行的变化视作贫困发生的原因，其用意在于讽刺英国的社会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群蜜蜂原来很邪恶，却生活得很幸福，后来它们改变了德行，却变得很穷困。他写道，这群蜜蜂在邪恶时：“几百万只竭力供应，彼此的情欲和虚荣，而另几百万只则被雇佣，眼看它们手工灵巧的作品被毁灭，它们装备了宇宙半个，可是所有的工作却比劳工人数还要多。”当它们变得善良、不再贪婪时，“当豪华和奢侈减退了，是它们逐渐离开四海，现在不再是商人了，但公司迁走了全部制造业，一切工艺和技能都被忽视于一旁，知道，这勤劳的毒害，使人们只赞赏他们家中的储藏，既没有人追求也不再贪得了。”^③

孟德斯鸠首先对贫民进行了划分。他指出，“贫困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政体的严酷而陷于贫困的，这种人民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因为他们的贫穷就是他们所受的奴役的一部分。另一种仅仅是因为他们轻视娱乐或不了解人生的各种乐趣，以致贫穷。这种人民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们的贫穷就是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的一部分。”^④ 显然，孟德斯鸠将贫困归因为政治压迫与重视奋斗、轻视娱乐。孟德斯鸠认为，贫穷的表现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不劳动。他指出，“一个人一无所有，不是贫穷；不劳动，才是真正贫穷。一个没有任何财产，但从事劳动的人，和一个有一百埃巨的收入而不劳动的人，是同样舒适的。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有一种手艺的人，并不比一个拥有十亩土地而需要耕种才能生活的人较为贫穷。一个工人把技艺传授给子女，就等于留给子女一份遗产，子女有多少人，这份遗产就变成多少份。这和那个依靠十亩土地生活的人是不同的，他只能把地产分割给子女。”^⑤

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指出，“懒惰违背人与公民的义务，因为人与公民的一般义务应当造福于某种事物，尤其要造福于其所属的社会。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此种义务，因为这是自然的要求”。显然，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将贫困归因为“懒惰”。布里索对贫困提出了自己的界定，他指出，“因为始终会存在富人，所以也应当拥有穷人。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穷人依靠劳动

①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42页。

②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3页。

③ 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1-92页。

④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16页。

⑤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6页。

为生；在其他国家里，他们衣衫褴褛，好吃懒做，告哀乞怜，不知不觉地侵害国家。让我们拥有穷人，但不要有乞丐。这就是一个良好政府应当追求的目标。”^①显然，布里索认为贫困和穷人的存在是社会的自然现象和需要。

吉尔伯特在1787年也指出，“我们对贫民的不幸的感觉每天都会受到伤害，与此同时，数百万英镑的钱用于向贫民提供救济。我们知道成千的劳动者在一种极为烦恼的状态下劳动，那就是贫困和疾病总是困扰着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愤怒地看到，成千的劳动者本该通过自己的血汗般的劳动挣到他们每天所需的面包，却不得不因为无法劳动、无法从教区或者自己那里得到生计而只能依靠济贫税。”^②可见，吉尔伯特将贫困归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生计。

二、关于社会救济的不同态度

启蒙思想家对社会救济的态度截然划分为反对和支持两种观点。反对实施社会救济的思想家不仅观点明确、直接，而且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笛福坚决反对救济院这样的机构救济。他指出，“那些救济院表面上看好像是很有用处的，实际上却有许多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因为它们混淆好坏，而且导致许多堕落者。我们都有可能陷于不幸的命运，如果诚实的绅士以及工商业者使其妻子以及孩子无以照顾，可以想象，让他们与那些流氓、乞丐、窃贼以及夜行者混在一起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将受到这些坏人的侮辱，忍受他们的褻渎及邪淫的语言，饱受肮脏之苦以及蚊叮虫咬。”^③笛福认为，不合理的救济或者施舍不仅对于贫民而且对于国家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当救济和施舍变得很随意时，乞讨就会变得很容易，乞丐就会增加，当其他所得超过正常工作所得时，贫民就会放弃工作转而依靠乞讨，于是就会造成乞丐遍地而劳动力短缺。他指出，“我认为我们想象中把向贫民提供工作作为我们的责任，而不是强迫贫民自己去寻找工作是非常怪诞的事情。”“如果贫民没有面包且不知道怎样挣得面包，成百上千的年轻健壮的家伙就将会像面对敌人冲锋陷阵的人那样死去，而不是躺在家中死于贫困与不幸之中。”^④

洛克指出，穷人流浪是自律不足和行为堕落的表现，对于他们中的身体强壮的流浪者，政府既不应该给予救济，也不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制止他们流浪。洛克提出建议，沿海各郡14—15岁的体格健壮的流浪者，曾在沿街乞讨的，应罚其在海军中服役3年。其他郡的体格健壮的流浪者则必须在贫民习艺所劳动3年。不足14岁的小乞丐应受鞭笞并送进劳动习艺所。^⑤阿瑟·扬也指出，“除了白痴没有人不知道必须使那些劳动下层阶级处于贫困之中，否则他们将不会勤奋工作。”^⑥

理查德·伯恩指出，不能对贫民提供任何公共救济，任何人如果对贫民提供救济，都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伯恩对每年任命一次的无薪酬的济贫监督官予以强烈批评。他指出，“这些

① 庞冠群：《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浙江学刊》2024年第4期。

②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gman, 1988, 54-55.

③ Harold E. Raynes, *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 A History*,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 Ltd., 1960, 103.

④ Harold E. Raynes, *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 A History*,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 Ltd., 1960, 90-93.

⑤ Gaston V. Rimlinger, *Welfare Policy,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 and Russia*, Wiley, 1971, 22.

⑥ Gaston V. Rimlinger, *Welfare Policy,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 and Russia*, Wiley, 1971, 16.

济贫监督官轮流地从一户到另一户转悠，所有的济贫监督官都希望采用对他们来说麻烦最小的办法来解决贫民的问题。”如防止没有许可证的贫民进入教区，或者将其交送治安法官遣送出教区，如果贫民携带许可证，则告诉教区居民不要给其提供任何可以实现定居的机会；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养活贫民；把贫困儿童送到工场做学徒；摧毁贫民搭建的窝棚；驱逐教区人口以降低济贫税等。他建议指派一名总监督官，他可以领薪并在所在区域控制所有的济贫监督官。^①

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勒特罗斯内将穷人区分“值得救助的穷人”和“流浪汉”。他指出，流浪者“生活在社会中，却不是社会的一员；他们生活在一个假设没有法律、没有管制且没有权威时人们就会陷入的那种状态。”他认为，流浪汉是法国文明社会中的野蛮因素，是潜在的罪犯与社会的敌人，应遭到严厉惩处，而不应该给予救济。^②

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与上述思想家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应该对贫民提供救济。孟德威尔指出，“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③

伯利指出，“为贫民提供比较舒适的生存条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肯定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每个人都不能泯灭了道德的范畴，这种责任的履行既需要政策也需要宗教，这是一种最大范围的慈善，如果在教区济贫院雇佣贫民，就将极大地促进英国的商业、财富与和平。”^④斯科特写道，“在一个早已宣布废除奴隶制且奴隶的主人已经无权强迫将自己的奴隶送往美洲的国家里，我们却遭遇到了对将其妻子和孩子留给教区负责的贫民的惩罚问题，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因为没有和家人一起忍受饥饿或堕入监狱的贫民进行惩罚的问题。”^⑤蔡尔德也指出，“如果我们的穷人都能得到工作，男女老少都能各尽所能，得到雇佣，那么，公共福利每年都会获得百万英镑的回报。”^⑥

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指出，“我们的根本原则是要让真穷人真正地拥有获取真实需要的权利。”他们指出，“唯有从事生产，唯有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农民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和必需的体面衣裳，才能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和土地的收入。唯有如此，他生活在农村才有意义。”“如果贫穷加剧……那么王国的财富会明显地减少。”^⑦博多指出，“当局必须负责满足所有公民的真正需求，无论是自然还是命运使他们陷入贫困。因此，建立一个完整、普遍和永久的爱国的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必须根据明智的、基督教的律令立即建立起来，”“我们热忱地致力于认真研究真正的穷人的所有需求、权利和义务。”他还提出，“穷人是教会首要的儿女，正如在公正的君主眼中，穷人在臣民中位居首位……在必要时向最贫穷的人预付一些钱，让他们以

① Harold E. Raynes, *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 A History*,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 Ltd., 1960, 102-103.

② 庞冠群：《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浙江学刊》2024年第4期。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4-675页。

④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gman, 1988, 19-20.

⑤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gman, 1988, 54-55.

⑥ Gaston V. Rimlinger, *Welfare Policy,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 and Russia*, Wiley, 1971, 20.

⑦ 普洛卡奇：《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0-41页。

当前价格购买面包。”杜尔哥指出，穷人“对富人的富余拥有某种无可争辩的权利。”他指出，“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抓住经济机会，利用机会并享受自己通过努力创造的财富。”“通过守时的劳动，人们可以改掉陋习，树立新道德，而这不能靠外部的强制与法律来实现。”^①魁奈强调，政府“不要减少最低阶层的富足。如果他们不能对无法消费的食物做出足够多的消耗，那么将会减少国家的再生产和收入。”“强制的贫穷无法使农民变得勤勉。唯有所有权以及对其财物的可靠享用才能让他们产生勇气，从事劳动。”他进一步指出，“让人民的菜单变得丰富，让他们疲于奔命地赚钱，乃是至关重要的事。”^②

三、关于社会救济的有限共识

虽然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救济存在上述对立思想和主张，许多启蒙思想家还是提出并主张对穷人提供适度的救济，这使得这一时期的西欧社会救济思想形成有限的共识。一些思想家提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贫民提供救济。孟德斯鸠就指出，“在经商的国家里，许多人纯粹依靠技艺生活，所以国家常常不得不维持那些年老的、有病的人和孤儿们的生活。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甚至是从技艺本身取得支持这些人的生活的资金的。它把工作交给一些能够胜任的人去做；它又让另一些人学习怎样工作；教人工作本身也成了一种职业。给街道上赤身裸体的人一些施舍并不就等于履行了国家的义务。一个国家对全体国民，负有义务使他们生活有保证，有粮食，有适宜的衣服，又有卫生的环境。”孟德斯鸠指出，设立济贫院是国家提供救济的需要，“一个国家要富裕，就必须有许多工业。至于商业部门，则枝叶纷繁，如果要始终没有任何部门受到亏损，因而工人们都老是感不到匮乏，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国家，不论是为着使人民免得受苦也好，或是为着避免叛乱也好，都必须进行救济。在这种场合，就需要设立济贫院，或制定某种相当的规章制度来防止这种不幸的发生。”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对贫民提供的救济应该是暂时性救济而非长期或者永久性救济，否则会导致对救济的依赖。他指出，“当国家贫穷的时候，个人的贫穷是从普遍的贫穷产生出来的，个人的贫穷也可以说就是普遍的贫穷了，世界上所有的济贫院也救济不了这种个人的贫穷；反之，济贫院将激励懒惰的心思，将增加普遍的贫穷，并从而增加个人的贫穷。”他进一步指出，“我已经说过，富裕的国家需要济贫院，因为命运使他们受到无数不测事件的支配。但是，我们感到，暂时性的救济要比永久性的机构好得多。苦难是暂时性的，所以救济也应该是暂时性的，而且还应该适用于特殊的偶发事件。”^③

一些思想家对济贫法及其实施机构济贫院提出自己的认识。卡利指出，济贫法应该仅仅是一个法律，教区应该提供各种设施与原料以鼓励合作体建立济贫院，这些合作体应以郡为单位组成，其规模应为100人左右，并由1个济贫院和1个感化院组成。海斯指出，每个郡都应该划分为多个区，每个区都应该建立济贫院和感化院，老人、儿童与残疾人可以进入济贫院获得救济，有劳动能力者进入感化院从事劳动。阿罗克提出建立3种不同类型的济贫院，一种是针

① 庞冠群：《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浙江学刊》2024年第4期。

② 普洛卡奇：《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2页。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6-137页。

对勤劳而没有劳动能力者的济贫院，一种是针对患病者的济贫院，一种是针对流民的济贫院。菲尔丁建议建立2个不同的机构，一个是郡济贫院，主要针对品行勤劳者，并在其中建有为患病者和老人的救济所；一个是针对流民的感化院，在感化院的宿舍和作坊旁边还要设有地牢和禁食房。失业的有劳动能力者可以进入郡济贫院，并为其提供工作救济。济贫院的规则应该非常严格，以致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进入济贫院获得救济。

伯利建议对各种济贫院进行登记注册，以改进济贫院中的劳动并鼓励艺术、手艺和科学，他还建议实行奖励制度以推进济贫院改革。马塞尔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对济贫院内救济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委员会由9名委员和42名普通成员组成，并有一支规模合适的领薪秘书和职员队伍。应该废除定居法，并在最需要的地方建立济贫院与感化院。塔克尔建议济贫院的规模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他认为，如果每个教区建立一个济贫院，其规模就会太小，但是，如果每个郡只建立一个济贫院，其规模就会过于庞大。^①

重农学派思想家博多认为，应该改革对穷人的管理制度，收容院应该主要扮演医院的角色，慈善机构应当更加了解穷人的需求，给予他们更恰当的救助。救济的权力应该下放，救济管理应该实行分散管理，同时又由国家高层控制，最高层管理机构是御前会议的总委员会，由国王本人担任主席，主要由神职人员、监察官、国务委员、高级贵族和高级官员协助。第二层级由省委员会组成，这些组织建立与下级机构的联系，充当和御前会议总委员会之间的纽带。博多主张将那些“假穷人”即“从未学过或实践过任何职业的身体健全的乞丐”纳入专门机构，在他们开始工作之前提供培训，这种培训应是强制性的，“不愿学习和工作的身体健全的穷人将成为罪犯，应该受到惩罚。”内穆尔倡导在家庭中救济患病穷人。他指出，在收容院中官员、神职人员、仆人、建筑、家具都得耗费钱财，都是过度增加的附属物，而在家中亲戚、朋友、邻居、慈善妇女都可以给患病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这样做也更能取悦于穷人。^②

杜尔哥指出，“不能随意地、草率地分配救助。”不对穷人进行分类，救济组织无法实现理性化；不“对各县的穷人进行登记，”救济将不可避免地助长懒惰。“应当把穷人分为两类，并提供不同的救助。一类是因年龄、性别或者疾病等原因而无法谋生的人，另一类是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前者应当获得免费救助；后者需要工资，最可取、最有用的施舍是给他们提供谋生的手段。”^③济贫管理部门既要给因年龄、性别或者疾病等原因而无法谋生的人提供救济，也要给拥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此类工作主要通过兴办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工程来提供。杜尔哥认为，对穷人的管理处于转型期，其关键是要提供恰当的救济手段，将长期行乞与流浪的穷人改造成士兵和劳动者。被收押在乞丐收容所的人应当是人们争取重新改造的对象。他提出一系列消除流浪陋习的办法，减少流浪穷人。首先，济贫管理部门应立足地方，解决“当地穷人”问题，这是确定贫困真实性，鉴别出哪些是“纯粹因为懒惰”而陷入贫困者的唯一方法。其次，应当驱逐“外地人”，将之遣返原籍，但要确保其在归途中获得各地济贫署的接力救助，防止他们中途脱逃、再度乞讨。再次，应当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机构网络以管理穷人的流动，尽量不要运用武力镇压的方法。“不应用骑警押解穷人。因为他们注定要变成自由人，所以应当让

①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gman, 1988, 48-52.

② 庞冠群：《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浙江学刊》2024年第4期。

③ 普洛卡奇：《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3页。

他们享受自由。如果他们偏离道路，没有回到原籍，那么再逮捕和惩治他们也不迟。”杜尔哥提出“每法里给1苏”的口号，即为每名被遣返的“外地人”每一法里提供一个苏。第四，应当废止一切有助于维持乞讨及相关行为的措施，不应该给聚集的穷人群体发放救济品，只能给他们发放指定商品的荣誉券，凭借此券，他们可以个别地获得必需品。

杜尔哥针对法国慈善工场提出了改善的办法：（1）应该根据穷人在年龄、性别和体力上的差别，为之提供不同等级的工资；（2）慈善工场组织的劳动，应当考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吸引力，否则它就会成为一种变相救济；（3）为避免吸引本可在别处找到工作的人，避免与普通劳动者产生竞争，慈善工场的工资应当始终低于普通工人的工资；（4）虽然在对乞讨者提供救助时尽量不要使用现金，但慈善工场提供的劳动报酬可以现金结算。杜尔哥认为，通过按时劳动，人们能够放弃过去的不良行为，确立新的行为与道德标准，唯有在这种方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把惩罚措施作为教育手段，并且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应当“释放那些没有被标记为坏人或者不可救药的不再乞讨的人。”通过这些做法，“除了居无定所的外地人和自愿选择的流浪汉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乞丐。”^①

四、关于预防贫困的全新主张

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就是否对穷人提供救济存在争议，较多的启蒙思想家主张实施适度的社会救济的同时，英国启蒙思想家笛福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以预防贫困而非仅对贫困提供救济的主张，这就是实施社会计划，尤其是实施互助保险计划。笛福在其《计划论》中提出，应该实施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计划，以改变英国社会贫困的现实。他指出，我所讨论的各种计划的性质都是有利于公众的，因为它们有助于贸易的改进和穷人的就业以及王国公共资本的流动与增加。不过，这种计划都是假定建立在发明才能和提出改进的诚实基础之上的，尽管我承认创造者主要是为自己谋利，然而，同时也必须符合于公众的利益。^②

笛福认为，计划是因人们要改变困厄处境而创制出来的。“在上帝的一切创造物中，人是必须自行谋生的最糟糕的生物。除了人以外，没有其他的动物会饿死。外在的自然为它们准备了衣食，内在的自然使它们具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万无一失地指导它们通过某种适当的手段满足自己的需要。然而人却必须工作才不会挨饿，必须像奴隶般的劳苦才不会死亡。的确，人天生有指导他的理性，遵循理性指导的人很少会沦入这样凄惨的绝境。可是，一个人如果因为年青时代犯了过失，把自己弄得山穷水尽，甚至完全丧失了金钱、朋友和健康这三样东西，他便会死于沟壑或者某个更糟的地方——济贫院。”他指出，使一个人沦落到这种田地的途径有万千条，而使他摆脱这种窘境的道路却没有几条。有些人选择死亡、盗窃、抢劫、伪造货币等，“又有一些人也是迫于同样的需要，却专心致志于创造以才能和诚实为基础的正当发明，最后这两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计划创制人’。”^③

笛福认为，通过实施一系列计划可以防止和缓解贫困。“我将开始讨论一个造福人群的计划，

① 普洛卡奇：《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3-44页。

②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页。

③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79页。

实行了这个计划，一切决非这样卑鄙、贫穷和无能的人，如果他是由于年老或遭逢意外而需要利用这笔钱的话，都有正当的权利、领取一份安慰自己的生活费。有一种贫穷不但不是可耻的，而且是清白的，这就是：人们遭到飞来的横祸、突然的天灾，譬如火灾、船只失事、丧失四肢等，变得一贫如洗，需要依靠别人救济，他们自己并没有过错。”这些不幸一般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博得他人的救济。然而，也有许多每况愈下的人家，他们的情况不是那样的公开，而他们的处境却相当窘迫。使人陷于贫困的原因不可胜数，而某些人穷极无奈，不得已才在世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景况，不然，他们就会饿死。于是行乞之风由此而生，而懒惰和游手好闲又使它进一步形成了一门行业。“可是，如果彻底实行了我提出的方法，行乞的原因便会根除，而结果自然也就杜绝了。”

在笛福提出的一系列防止贫困的计划中，储蓄计划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考虑不周是人们当年青力壮时不为年老和患病时作打算的主要原因，保证不发生这种弊病的建议概括起来只有这么几句话：所有的人在年青、健康、能够工作并且可以积蓄一些钱的时候，应该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交由可靠的人保管，作为一笔放在银行里的存款，以便在他们因年老或发生意外变成残废或无力自养的时候，能够因此得到救济。如果蒙上帝保佑，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始终不需要这种救济，剩余的钱可以用来救济那些需要救济的人。”

笛福提出建立一项年金计划的主张。他指出，我建议在某一个方便的地方建立一个年金局。乞丐和兵士除外的任何诚实的劳动者，不管他们的职业或境况如何，不管他们是男是女，凡四肢完好、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前往该局在专备的登记册上把他们的姓名、行业和住址登记下来，在登记的同时缴纳六便士注册费，以后每季度缴费1先令，则每人将得到一份由该局盖印的、保证他们享有各项权益的保险契约。

笛福所提出的年金计划的参加者的主要权益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这些缴费者之中如果有人发生除了醉酒和争吵造成的意外之外的任何意外，折断了四肢、关节脱臼或受了危险的撞、跌、压、瘀等伤，由该局特意指定的高明的外科医生负责予以免费治疗；（2）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患有重病，该局接到通知后即派医道精良的大夫去为他们治病，并且免费开方；（3）如果他们由于上述疾病或意外丧失了四肢或眼睛，以致显然不能工作，同时又穷得无法自养，年金局应出资为他们治疗或发给他们终身赡养年金；（4）如果他们变成跛子、年老或者由于身体真正衰弱而不能工作，同时又无力自养，一经查明属实，就会把他们收容到专门为此设立的救济所或济贫院，使之终生受到良好的赡养；（5）如果他们是海员，在他们服务的商船上死在国外，或者因船只失事溺死，或者因被俘死于奴役，他们的妻子在寡居期间将领得一笔年金；（6）如果他们是生意人并且缴付过教区济贫税，万一他们由于营业凋敝和失败破产，因欠债被投入监狱，他们将领得一笔年金，作为他们在监禁期间的生活费；（7）如果因病或意外，他们暂时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在向年金局说明真实情况以后，该局将依照理事们斟酌的情况对他施予救济。^①

笛福不仅呼吁建立其所提出的互助性储蓄保险与年金计划，而且呼吁人们积极参加这些计划。他指出，“我盼望大家想一想我国的现状，然后告诉我。假使全英格兰的人，不论贫富老幼，每人每年都向一个公共银行缴纳四先令，同时，这四先令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和诚实的管理（不论是一个个死了的人，或者是从不需要救济的人所缴款项的余额都在内），这笔钱岂不是就可

^①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3-125页。

能养活所有的穷苦无助的人，因而永远消除王国中的行乞和贫困现象了吗？”为了促使人们积极参加互助性储蓄保险与年金计划，笛福认为，应该终止任何济贫院对贫民提供的救济。他指出，“为了促使教区为这项计划出力，济贫院理事应该向教区保证以后不会再让教区花钱救济任何人，这一定能使各教区都努力让教区内一切比较卑微的劳动者完全加入保险；因为这种办法必使教区到时候将完全摆脱教区内所有的贫民。”^①

五、社会救济思想的根本特征

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对贫困及其原因的解释方面。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人们失去工作所导致的，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道德堕落所导致的，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人们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人们懒惰所造成的，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政体的原因导致的，有的思想家认为贫困是由于人们忽略了娱乐所导致的，可谓众说纷纭。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启蒙思想家对社会救济的态度，明显地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贫民提供救济，这是大部分思想家所持有的一种观点。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不应该对贫民提供救济，他们认为对贫民提供救济往往会导致其对救济的依赖。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不同思想家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较多思想家认为应该实施适度的救济，如提供一些劳动救济，对值得救济的老弱病残者提供救济。

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一种全新的预防贫困的主张的提出，这就是笛福提出的互助保险和年金计划的主张。笛福的主张较之其他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笛福提出的互助保险和年金计划的主张呈现出鲜明的预防贫困的特点，他希望通过互助保险和年金计划预防贫困的发生，而非当贫困成为一种事实的情况下给予救济。

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复杂性特征有其深刻经济、社会与政治背景。首先，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欧经济转型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这种转变过程又呈现出两种鲜明的形态，一是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农业经济的转型，一是以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工业经济的出现。无论是农业经济的转型还是工业经济的出现，都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劳动力失去土地或者失去工作，从而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流民队伍，对西欧经济、社会与政治产生很直接的影响和压力。

其次，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欧社会转型的时期。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背后隐含着西欧社会的一种转型，这种社会转型集中体现为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神权社会向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社会的转型，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世俗生活中的问题，贫困问题即是世俗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宗教改革表面上是一种思想或者是文化转型，它其实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社会转型，从以神或者宗教作为个人生活的核心，转变为以

^① 《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3-134页。

世俗作为个人生活的核心。原来由教会所承担的许多慈善救济功能，逐渐随着宗教改革而失去。宗教改革导致的宗教慈善救济功能和地位下降后，就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救济主体来承接社会救济的功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如何看待贫困问题？是否对贫困提供救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提供救济？这些问题就成为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必然要面对和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再次，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欧政治转型的时期。西欧政治转型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西欧开始了由宗教神权政治向世俗权力政治的转型。这个转型过程通常被称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建立时期。在这个民族国家兴起和建立的时期，如何认识贫困？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贫困？如何去承接原来由宗教慈善所履行和承载的救济功能？这些就成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世俗政权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事关作为民族国家的世俗政权是否可以获得公民认同的关键因素。因此，西方的思想家就把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出现视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体现。

虽然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具有复杂性特征，但是，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先进性和意义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走向世俗性这一根本性特征方面。

第一，西欧关于贫困及其原因的解释具有世俗性。在宗教神权时代，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人生来就是赎罪思想和观念支配着人们，人们往往用赎罪等宗教术语来解释贫困及其成因。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欧社会开始使用一些世俗的原因和现状来解释贫困及其原因，这是西欧社会关于贫困及其原因的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变化。贫困及其成因的解释的世俗化奠定了西欧民族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认识基础。

第二，西欧关于贫困救济的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宗教神权时代，救济方式一般是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教义方面，《圣经》本身提倡富人对穷人给予帮助，强调上帝的福音惠及全体教众；^①一个是精神方面，人们用向上帝的忏悔和赎罪等方式达到自己内心的安慰；一个是方式方面，用宗教慈善救济尤其是教堂向穷人提供生活的帮助。在启蒙运动时期，宗教慈善救济逐渐转化为世俗救济，世俗救济往往又以制度性救济的形态来呈现。人们不再追求通过宗教性的忏悔和赎罪求得自我忍耐和上帝的宽恕，而是主张通过不同的方式、适当的程度对贫民提供制度性的救济。贫困救济方式的世俗化标志着西欧民族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开端。^②

事实上，早在13世纪，西欧社会对贫困原因的解释就已经开始从宗教转向世俗。13世纪法国思想家约翰·德·墨恩指出，“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至少在没有哪一部我们的法规中，会说基督及其信徒四处流浪时，有时像乞丐一样乞讨面包：他们不愿意行乞（巴黎的神学家当时却这样教人）……一个健康人，如果没有生计，就必须用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即使他是个教徒或甘愿服侍上帝……圣保罗要求使徒们靠劳动来挣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用以下的话禁止他们进行乞讨：‘靠你们的双手劳动为生，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法国历史学家勒戈夫指出，“贫穷的信条起源于禁欲，禁欲是对现世的否定，是面对人类和自然的悲观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同大多数大学成员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产生了冲突。而且更主要的，由于提倡贫穷，结果在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和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那里造成了行乞的风气。

①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页。

② 丁建定：《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学海》2013年第1期。

对于这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很难把一种使人联想起贫困的状况当作理想提出来，何况全体劳动者正试图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救出来。”^①

第三，西欧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构成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包括丰富的内容，在社会思想方面如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如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等。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如贫困及其成因的思想，是否提供救济的思想，以及如何去实施社会救济的思想，特别是笛福所提出的实施互助保险和年金计划来预防贫困的思想等，构成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②

总之，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西欧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生活构成了西欧的中心，在以人为核心的世俗社会中，宗教服务于世俗生活，神权服务于世俗政权。这个以人的世俗生活为核心的世俗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就构成了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便是自然法学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学说、代议制学说等。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构成启蒙思想家关于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社会如何组织和运行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说启蒙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基础，那么，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也就奠定了西方现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基础。

From Religious to Secula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Relief Thought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Era

Ding Jianding

(School of Sociology / Elder Service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leading to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lief, which becam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e evolving discourse on social relief encompassed varying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and its causes, deb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aiding the poor, limited consensus on appropriate relief measures, and emerging proposals for poverty prevention. Despite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relief ideas during this time, thei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was a shift from religious to secular perspectives. The social relief thought of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modern Western social security concepts.

Keywords: Enlightenment; poverty; social relief; mutual insuranc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华颖)

①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② 丁建定：《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6-47页。